

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

第一辑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董仲舒与司马迁的时代关系	程金造(1)
司马迁“南游”年岁和有关问题考辨	王重九(7)
司马迁的人格及人格观念	张文立(16)
司马迁对个性的认识及他的个性	徐兴海(28)
毅力胜挫折 心血铸长城 ——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	张新科(41)
论司马迁的伟大史学人格	王士伟(56)
司马迁传记文学中的人格理想	陈兰村(69)
试论司马迁人格结构的成因	高益荣(82)
司马迁的经学与史学	王天顺(95)
历史的审美与诗化 ——司马迁历史审美观初探	马 强(112)
从司马迁对分封制的论述看其大一统的历史观	孙文阁(129)
司马迁宗教观浅议	黄世坦(138)
重评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陈桐生(146)
司马迁与现代中国	韩兆琦(160)
司马迁经济思想与当代市场经济	韦 第(174)
论司马迁求富的义利观	李淑萍(194)
司马迁游历路线考	艾 冲(208)
论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评价	徐卫民(219)

清人论“史公三失”	朱思红(229)
也谈杜甫“似司马迁”	王友怀(238)
关于“司马迁与李陵事件”专题讨论综述	
.....	韩城市司马迁学会(253)
司马迁生地与祠堂是一个地方	
——中国龙文化的微观研究之一	王增斌(263)
司马迁子孙失踪之谜	吉 磊(284)
徐村“汉太史遗祠”	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徐村小组(287)
略谈《史记》散文的叙事与语言	张大可(289)
《史记》中的兵家“治产”尝试录	宋朝康(299)
《史记》人物传记的符号学特征与阐释	齐放斌(311)
《史记》上溯性比较论说	可永雪(319)
《史记》人物处世哲学论	黄新业(326)
《史记》对中国史学影响新论	周一平(340)
《史记》纪传体对政书体的影响	马雅琴(357)
论《史记》的述史构架	赵生群(365)
论《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	俞樟华(379)
《史记》所见西汉以前的区域类型和区域年龄	侯前坚(393)
《史记》所见秦汉时期自然崇拜对道教多神崇拜的影响	
.....	文 军(411)
《史记》中“通变”思想的体现	叶 荣(419)
赵氏孤儿的故事及其他	
——《史记》记事两存异说释例	李西兴(424)
《史记》所述周初纪年勘证	王 晖(434)
《史记·日者列传》小察	张铭洽(447)
《史记·货殖列传》人物传述别论	周建仑(470)

《史记》《汉书》游侠之比较·····	贾俊霞(488)
试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吴光坤(496)
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	
——兼谈司马迁的妇女观·····	高飞卫(508)
从《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仓公医案谈养生的禁忌·····	张维祺(517)
蘸泪直书英雄碑	
——读《项羽本纪》札记·····	张宁(523)
《史记》所载韩城政区历史起源探疏·····	冯光波(530)
《史记》正本藏何处·····	冯学志(536)
中华点校本《史记》标点举误(续一)·····	张家英(539)
《史记》词话·····	郭芹纳(547)
论陈直先生的《史记》研究·····	黄留珠(555)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首届年会交流论著目录·····	张新科(565)
编后记·····	(569)

董仲舒与司马迁的时代关系

程金造

顾先生《司马谈作史》一文，其意主要是发自董仲舒的时代。因为《刺客列传·赞》有：“始公孙季公、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之语，顾先生以夏无且平生，惟在荆轲刺始皇时，以药囊提轲一事，最著名；董生既与夏无且游，则必为秦末汉初之人；待迁之长而告以刺秦之事，已将百数十岁，其相见为不可能之事。因此认为《刺客列传》为太史谈之手笔。《樊鄱滕灌列传》有樊噲孙它广，《酈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朱建之子，皆与太史迁世不相及，与董生同。这都是从人物时代证明笔迹，而诸人以董生闻于夏无且刺秦之事最早，故断定此三传是迁父太史谈的手笔。

案《太史公自序》篇中，说《春秋》之学是闻之董生，而下文就以数百千言，大述《春秋》之义。裴氏《集解》引服虔《汉书注》，以董生为董仲舒。仲舒是西汉初期的《春秋》学大师，今有其讲《春秋》的《春秋繁露》一书传世。服虔之言，有足信者。

《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都著仲舒为《春秋公羊》家大师，而《汉书》有《董仲舒传》。传中述仲舒为广川人^①，景帝时，为博士。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原是仲舒对策始发之议。

曾相江都、胶西两国，又曾中废，为中大夫家居。每朝中有大议，遣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当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殿灾时，仲舒家居，推说其意，其草稿为主父偃窃去，奏于朝廷。武帝召视诸儒，而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为其师书，以为大愚，遂下仲舒吏，当死，而被赦，年老终于茂陵。事都不著年月。但是《董仲舒传》中的关系人物，有胡毋生、公孙弘、张汤、江都易王、胶西王，弟子褚大、吕步舒等人，若从诸人行事，考证董生平，其先后行事，皆可以历历在目。

—

仲舒为景帝博士，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只据汉书本传著“仲舒少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胡毋生同业。而胡毋生则著其字子都，齐人，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师。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业焉”。就此可知，胡毋生虽与仲舒同师，其年当大于仲舒。胡以博士年老归齐，则仲舒仍以博士居京师可知。《春秋繁露·五行对》，述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②，以孝经云云。案献王德以景帝前二年立（丙戌，公元前一五五年）。景帝前三年（丁亥，公元前一五四年）、中元元年（壬辰，公元前一四九年）、后元元年（戊戌，公元前一四三年），皆朝京师，仲舒之得见河间献王，当在此三年中，惟无实据准确定在哪年。景帝在位十六年而崩。武帝建元五年（乙巳，公元前一三六年），《汉书·武帝纪》及《前汉纪》卷十，都著置五经博士，仲舒此时仍当为《春秋》博士。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一三五年），《汉书·武帝纪》著二月，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而《史记·太史公自序》，著太史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建元六年仲舒为博士，与太史谈同为太常属

官，有相见机会，家又都居于茂陵；而太史迁生于景帝中五年（丙申，公元前一四五年），此时已十一岁，随其父谈居京师，能以晚辈随父与仲舒相见。元光元年（丁未，公元前一三四年），《前汉纪》卷十一云：“冬，初令郡国贡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发其议。（又见汉书本传仲舒对策），仲舒广川人也。初，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读书，弟子以次传授其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其园，其精专如此。”而《西京杂记》卷五，著七月京师雨雹，鲍敞问董仲舒阴阳之事。是仲舒此年犹在京师。元光二年（戊申，公元前一三三年）《春秋繁露·止雨》篇，著是年八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阴雨太多，恐伤五谷，趣止雨。是仲舒此年已由博士改相江都国，事易王。元光五年（辛亥，公元前一三零年）《汉书·公孙弘传》著是年公孙弘复为博士。元朔元年（癸丑，公元前一二八年）江都易王薨。案易王以景帝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七国反时，因击吴楚有功，徙王江都，二十七年薨。是易王非在此年薨。而《汉书·董仲舒传》著“江都易王非薨，仲舒废，又为中大夫。”又言：“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家居，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罪，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事。”是仲舒为中大夫时，说高庙灾异之事。而《汉书·主父偃传》著元朔元年为郎中，于元朔三年诛死。故知其窃仲舒草稿在此年间。元朔五年（丁巳，公元前一二四年），《汉书·儒林传》著公孙弘为丞相。又《董仲舒传》云：“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为纵谏。弘疾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胶西王。”是仲舒于元朔五年，公孙弘为丞相时，出相胶西。元朔六年（戊午，公元前一二三年），《汉书·董仲舒传》著曰：“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

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修学著书为事。（中略）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

从以上诸事看来，董仲舒从景帝时为博士，至武帝立后十八年，事皆见于诸书。其年老居茂陵家中以后，事虽未见著出，但其寿尚不止于元朔六年（公元前一二三年）。

太史迁生于景帝中五年（丙申，公元前一四五年），当其父太史谈于建元至元封间为太史令时，迁当随其父居京师。建元五年，太史迁已十岁，在京师从师诵左氏古文。元朔二年（甲寅，公元前一二七年），郭解徙居关中，太史迁时年十九，曾亲见郭解，察其貌，聆其言，觉其识见无足采者；（见游侠列传）而《通鉴·汉纪》载武帝元朔二年曰：“帝欲以孔臧为御史大夫，臧辞曰，臣世以经学为业，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从弟侍中安国，纳纪古训，使永垂后嗣，帝从之。”是孔安国由侍中改官博士，在此元朔二年。元朔三年（乙卯，公元前一二六年），《汉书·公孙弘传》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族诛郭解。（见游侠列传）又建言诛主父偃，（见汉书主父偃传）。元朔五年（丁巳，公元前一二四年），迁年二十二。《汉书儒林传》著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始为博士置弟子员，其上奏事曰：“臣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孔安国此时为博士，司马迁以十岁诵左氏古文功力，今其年二十二，当是被选为博士弟子员。元朔六年（戊午，前一二三年），司马迁以一岁辄课，得高第，为郎中。董仲舒为胶西相以

病免，归居茂陵。元狩元年（己未，前一二二年），公孙弘卒，年八十岁。元鼎六年（庚午，公元前一一一年），武帝定西南夷以为五郡。司马迁年三十五，以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元封元年（辛未，公元前一一零年），司马迁年三十六，奉使西南夷还，与父太史谈会于河洛之间，而谈卒。（见《太史公自序》）元封三年（癸酉，前一零八年），司马迁年三十八，继父任为太史令。

从以上诸事看来，董仲舒与太史迁是先辈与晚辈，彼此生世相及，只有先后之差。

二

顾先生持论最主要者，是夏无且为秦时人，而荆轲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为公历前二二七年（甲戌）。当时夏无且为侍医官，曾以药囊提荆轲。此事下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前一四零年）有八十七岁距离。但是，不知夏无且当时年岁多大，如果其年届八十，体力衰孱，他自然无有提击持刀行刺之勇气。如果夏无且年在二十之少壮，体力方强，眼见天子生命方危、群臣恐愕之际，爱国心切，必然独出奋起，来相助战。若是夏无且当时在少壮之年，秦亡之后，下至景帝后元三年，不过八十六岁距离，当时夏无且尚在八十岁左右^③。董仲舒生年不可知，他在景帝时为博士，年小于胡毋生，不过与公孙弘相伯仲。公孙弘八十岁卒，尚与太史迁生世相及，是仲舒在二十岁时，当可与夏无且往还，为忘年之交。从此看来，董生上固可以与夏无且相及，下也与司马迁相及。而《刺客列传》称作董生，生是先生之同称，是尊敬长者之词。而只有《太史公自序》中有董生，又大述其讲《春秋》之义，足证董生就是董仲舒。《史记·宋世家赞语》曰：“太史公曰，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见隐三年公羊传）又曰：

“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以为多（见公羊僖二十二年）伤中国缺礼义，褒之也，宋襄公之有礼让也。”这都是“公羊家说”。此又可证太史迁曾从董仲舒学《公羊》之义，所以称董仲舒为董先生。推想仲舒家居茂陵，而太史迁也居住在茂陵（见《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此如今日之同里、一乡。太史迁从其父谈之时，就随父与仲舒常以文相会，其后亦必从董生问公羊之义。因此《史记》述史事虽多取左氏传，而其发议论事，多本《公羊》。所以董生的生世，不但与太史迁相及，也可能《史记》中《公羊》之说，也受自董仲舒的。

注释：

①《汉书补注·董仲舒传》，王先谦引齐召南曰：“按志，广川属信都国，今直隶（河北）枣强县有广川镇，与景州相近，即汉广川故县。”又引沈钦韩《汉书疏证》曰：“纪要，广川城在冀州枣县东北十八里。《春秋繁露·五行对》，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则仲舒为广川温城人也。《水经注》，桑林旧沟又东经修市县故城北，王莽更曰居宁，俗谓之温城，非也。《地理风俗记》曰：“修县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县也。按修市属渤海，以俗称温城证之，则修市即温城所改，其后改属渤海耳，于明为景州西北有修市故县。”又引王文彬曰：“《魏地形志》，冀州渤海郡修县，有董仲舒祠。”

②温城，见注①。

③从始皇二十年荆轲刺秦时，假设夏无且年二十算起，至景帝后元三年，为八十六年。

（张新科审定）

司马迁“南游”年岁和有关问题考辨

陕西省文史研究馆 王重九

一、发现问题和考辨的简单经过

关于今本《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所谓“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两句，历来治史各家大多信以为真，迄少异议，在我则久经探索，深感可疑，窃以为必非司马迁之原文，乃系雕版问世以前，在长期辗转传抄中由于疏忽不慎而造成。1991年10月，因出席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西安汉唐典籍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曾先事撰写《司马迁“诵古文”年岁和从师时地考辨》^①一文，主观认为司马迁“诵古文”应为“年二十”，又于文末肯定司马迁开始“南游”，可能为年“三十”。奈以当时内障在目，仓卒成文，未尽所怀，未乘草撰此文，故复略而言之。

我对此二句之怀疑，初从“二十而南游”开始，然后上及“年十岁则诵古文”。因为根据一般文人之水平，总感到即或十岁诵古文，进而广读其他典籍，经过十年时光，虽有严父名师殷切教诲，自己学习再好，到头来究竟能吃透若干？掌握多少？而况

司马迁这次“南游江淮”，“北涉汶泗”，既不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式的游山玩水，纵情酒色；又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式的走马观花，快意朝夕；更不是“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式的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乃系上承汉武帝之俞允，下奉严父之使命，始得“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其行也必有预定之路线，其游也必有预定之地区，数经寒暑，先江后淮，遍历东南胜地，北涉汶泗，留连忘返于孔孟之故里，车鳞马萧，朝行暮止，古往今来，兼收并蓄，万里江山，尽收眼底，上关国计，下切民瘼，纵横驰骋，学殖益深，时出如椽之笔，从容载记，然后整齐简编，饱载而归长安。既完使命，又了心愿。如此光荣而艰巨之任务，试问一个年仅“二十”，学无根柢，初出茅舍之青年，即或天赋不凡，聪慧过人，也恐怕是绝对做不到的。反之，惟有饱学博识，心有主宰，年已“而立”，如司马迁这样的中年学者，庶几可以。

起初，对此相差十年，迹处疑似，惑而不解，但又苦无佐证，以致扑朔迷离，冥想悬思直如“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约略计之，几近二三十年之久。后见革命导师恩格斯而著《论马克思》一书，当读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伦被判罪之后，马克思离开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十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藏书……”^②时，不禁心花怒放，大悟所以。原来百年以前，伟大天才如马克思，在其旅居英国伦敦时，为了改造旧的政治经济学说，为了完成不朽的《资本论》，尚且孤心苦诣，历时十年，方成第一卷，而况远在两千一百多年前的初知攻读的司马迁？正如前文所考辨，司马迁初到长安，年已二十，则“二十而南游”，是绝不会有之事；如果认定为“三十而南游”，则从“年二十则诵古文”到“三十而南游”，二者中间所隔的“十年”，恰正是司马迁在长安跟随严父名师苦心孤诣，全力攻读之十年。最

后，在见到葛洪的《西京杂记》^③里有关司马迁出游的年龄记载时，方才真正地越过了这一障碍，突破了这一禁区，解决了这一从来极少有人发问过的关于司马迁开始南游的具体年岁的老大难问题。

二、关于司马迁“三十”而南游的文献根据

初读晋人葛洪所撰《西京杂记》，见有“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司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当时疑其年龄过小，难胜其任，未便相信。比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观其在“元光二年戊申、十三岁”条下所考，深受启迪。为便说明，抄引如下：

案《汉旧仪》（原注：《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原注，《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则卫宏（笔者注：指《汉旧仪》作者）说非也。或本作“二十”，误倒为“十二”，又讹“二”为“三”欤？^④粗读之，颇觉有理，细味之，实属似是而非。在我则以为原本当作“三十”，倒误为“十三”，为我主观肯定司马迁开始南游在年“三十”，不是年“二十”的文献根据。

三、关于司马迁出游的几个问题

首先，司马迁既未身入太学，自非博士弟子成员，作为布衣之士，凭什么“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考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出于司马迁的自觉自愿。如上所言，司马迁年二十，西到长安，经过精心苦读，既熟习祖传文史星历，通晓六家要旨，广

涉典籍，学有根柢，但以秦始皇焚书于前，楚项羽火烧咸阳于后，中间虽有萧何初到咸阳时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而先秦文化遗产，得以完整保存者，究属无几。好学若渴之司马迁，生值此时，虽欲继续深造，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以书缺有间，远难满足。同时，又因父谈为当朝太史，存心继《春秋》而撰述通史，无奈资料短缺，时作时止。当此时也，父子相对，言必及此，国家收藏有限，当设法于民间求之，心心相印，一拍即合。再就司马迁而言，年已“而立”，赋性“不羁”，既读万卷之书，对作万里之游，早已跃跃欲试，一则扩大视野，印证所学；二则，“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期上报君亲之使命，下作继承史官之准备。其所以不见及早出发，主要条件未具，等待时机。

第二，由于司马谈之举荐。司马谈身为太史，既掌管文史星历，朝会之际，记言记事，日侍武帝之侧，巡幸四方，职在扈从，公余多暇，志切著史，观其临朝对子迁之谆谆嘱托^⑤，足见其平日之心迹。著史首在史料，对其所掌管的古今图籍，孰有孰无，孰全孰缺，心有所积，必会对武帝屡屡言之，甚且会相机建议，应派专门人才，周历天下，广事搜罗，而重点尤在“求古诸侯之史记”。次在武帝方面，向来好大喜功，对于连任太史二十四年之久的司马谈，忠贞耿耿，甚见信任，初闻其言，或难其人，在司马谈方面，早已胸有成竹，定会乘机援引“内举不避亲”之故例，即以子迁相举荐，幸蒙见许。此对司马迁之如愿南游，诚属千载一时之大好机遇。

第三，由于汉武帝的恩许。根据《史》、《汉》有关记载，汉武一生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既重武功，亦崇文治。其在继承先秦文化遗产方面，尤见功绩。班固曾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

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④揆诸此举，当与司马谈之建议，和司马迁之南游访求，不无密切之关系。加之犹在即位之初和稍后，对于奖拔人才，若恐不及，例如多次下诏求贤，亲策公孙弘、董仲舒，礼聘申公，大兴太学；又于元朔元年（前128）冬十一月，诏以“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责求二千石⑦。对于有才能、有声望者，尤乐于援引和重用。比及司马谈以子迁相举荐，武帝当亦会以求之不得而见爱，既允其所请，并恩许司马迁可以“乘传行天下”。此在《西京杂记》里，由“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三十，使乘传行天下”云云，已见端倪，良以司马谈使子迁南游则可，而“使乘”传以“行天下”，司马谈虽为太史公，却没有这个权力。若谓《西京杂记》多不可信，则请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亲口说的“幸主上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不正指的“南游”一事，又是指的什么事！为节篇幅，容后再论。

综上所述：司马迁南游原因有三，开始南游时，年已三十，时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司马迁南游的年龄、时间和原因问题，多少年来，仅见王达津先生曾有专文论及，题目是《读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后》⑧，拜读之余，未敢苟同。为了明因果，定是非，特予节引，加以辨析。

王先生云：“太史公南游必在元鼎元年，方合乎实际。”按时间说，倒属正确，但从年龄上，却肯定司马迁是二十岁。因为他也是坚信郭沫若所谓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而并未予以深考的学者之一。他又说：“考查太史公十九岁（原注：按生于前135年）那年夏六月，《汉书》上记诏以改币的关系，天下纷然其扰，特遣博士大（原注：褚大）等分循天下……

(《汉书·武帝纪》)。《史记·平准书》也说:‘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那么太史公必在分曹循行的随从之选内,当他二十岁时便到江淮。又元鼎二年关东大水,又诏博士中等分循行(《汉书·武帝纪》)。则这时期博士等循行天下是非常普遍,因此给太史公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必得的结论。”

请看我的看法。一,王先生所举两次博士分曹循行,都是事实,但司马迁既未身入太学,并不是博士弟子,凭什么能被选入随从人员之内?二,如果真被选入,必听主官指使,循行所至,能否按照司马迁“求古诸侯史记”的需要,辟出足够时间,令其往来自如,一如《自序》所云:上会稽,浮沅、湘,讲业齐、鲁之都,过梁、楚以归长安?三,前既云“太史公南游必在元鼎元年(前116),方合乎实际;后又云元狩六年(前117)以“入选”随褚大等分循行天下,按当时奉命出循原分六路,王命在身,急如星火,不论司马迁分履哪一路,试问谁敢为等候一名无关轻重的小小随员司马迁,而暂将循行出发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年?

由此可见,司马迁之南游和褚大等的循行,二者之间,毫无干系。王说既难成立,其“结论”亦自不合“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的逻辑。

第四,关于司马迁的出游路线,在《自序》里原已写得非常具体,只尚有三个或大或小的问题,也须粗予辨析。

其一,今本《史记·自序》里,首言“南游江淮”,意即先江后淮,先中游,后下游;但在史文所叙次第中,却是先“上会稽”,后“窥九疑”,人或以为异,我则认为除传抄不慎之外,还有原简折损,上下倒置之可能。正如王国维所云:“考《自序》所记,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游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既西复

东)，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⑨只美中不足的是，误将“梁”、“楚”作了倒置，有背于当年司马迁在游访途次中的历史事实。

其二，在《自序》里，司马迁又言“厄困蕃、薛、彭城”。各家注译多未能达其本意。按司马迁在《孟尝君列传》中，自言“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杰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蕃、薛、彭城三地既相邻近，其闾里民俗，当不例外。观“闾里多暴杰子弟”一语，是其所谓“困厄”，当指其所遭不幸，或为暴杰子弟所围劫，或被暴杰子弟所凌辱。司马迁虽未明言所以，自可推想而知。

其三，司马迁又言“过梁、楚以归”句中的“梁”和“楚”，究竟各何所指？关于“梁”，原指战国七雄中魏国自安徙都大梁之后，一般多称为“梁”，亦称为魏。古之大梁，即今河南开封市，向无异议。惟近来有人却注作开封为汉代诸侯梁国之所在，故称曰梁，虽违迁意，亦备一说。但关于“楚”之所指，据我所见，却并不这样简单。

按照王国维的看法，说是“观春申君故城宫室”^⑩，但司马迁从会稽北上渡江之前，早已看过，自无回头再去之理；金毓黻在所著《中国史学史》^⑪里说：“是武汉”，还有人说，“楚”在今湖北省；更有人说“楚”指先秦楚国故地。又检《史记》“三家注”和日人泷川资言所撰《史记会注考证》，却皆一字未及。此外，惟有王伯祥于《史记选序例》中，朦朦胧胧地说：“楚（约指当今江苏、安徽、河南三省交界一带地）。”按地方是说对了，但与具体史实仅仅相隔一纸，未见戳而破之，点出其所以然，其他所谓“武汉”、“湖北省”和“先秦楚国故地”，试问司马迁出游所到之处，除故齐“临淄”，和故魏“大梁”，又哪一处不是先秦楚国之旧地。

若问此“楚”究何所指？一句话，实指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陈涉所建的“大楚”，包有大泽乡和都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地区。